

# 有意拖延的告别

卡夫卡

的文学人生

于荣健 著

一本风格犀利的

有关卡夫卡的读书笔记。

结合卡夫卡的八部作品和人生故事，

“散点透视”地解读

其无限的丰富和可能性：

他的欲、他的爱、他的怕、

他的谱系、他的观察、他的逃离……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有意拖延的告别

卡夫卡

的文学人生

于荣健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意拖延的告别：卡夫卡的文学人生/于荣健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2

ISBN 978-7-5473-1075-5

I. ①有… II. ①于… III. ①卡夫卡(Kafka,  
Franz 1883—1924)—传记 IV. 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4662 号

## 有意拖延的告别——卡夫卡的文学人生

---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173 千字

印 张：7.75 插页 2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075-5

定 价：30.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 序

## 写作就是卡夫卡的存在

顾 彬

大概 18 岁时，我在 Rheine(莱内)的高中第一次读到了卡夫卡的作品。Rheine(莱内)是当时西德西部的一个小城市，它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那所学校也比较古老，大概是在三百五十年前成立的。我们的老师非常严格，非常保守。不过，他们还是经常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最进步的文人与思想。有一天，我们的德文老师要求我们跟他一起朗读和分析卡夫卡(1883—1924)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作品的题目非常奇怪，它叫《骑桶者》，写法也古怪，今天说它是 kafakaesque，这是英国评论家 1938 年编辑的新的形容词。总之，我们不懂。人怎么能骑桶呢？疑问很多，我们糊里糊涂的。

在中国诗人于荣健《有意拖延的告别——卡夫卡的文学人生》这部读书笔记里，一共有八篇文章分析卡夫卡的作品，其中就选了这篇小说。这让我非常感动，因为他带我回到了往日的时光。这

样的岁月已经逝去五十多年了，中国人说，往事如烟。不但他在思考自己初读这部作品的时光，也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纪念我的学生时代。因此，他和我的记忆，如同卡夫卡感召下的一对好兄弟。我们都知道，怀念不只是情感方式的打开，更是所有写作的开始。

我们学生时代第一次读到卡夫卡，虽然什么都不清楚，但觉得作者的语言令我们神往。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我和我的祖母在我的故乡 Celle(策勒)度假时，我就把卡夫卡的全集都看完了。这大概是1964年。我看得懂吗？看不太懂。事实上，至今在德语世界，能看懂卡夫卡的，仍属少数人，而且大部分还是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还要阅读呢？是由于卡夫卡语言水平的原因为。文学首先是语言，语言有它的标尺，也可能除了语言之外什么都不重要，又或者，至少其他的，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写诗，写小说，写评论。好的语言，从那个时候起，就是我的写作目的。也许，还是我唯一的目标。

好的语言，好的德文，这就是卡夫卡。从今天来看，卡夫卡属于捷克人。从当时来看呢？他是奥地利人吗？算了吧，别再问。欧洲的历史太复杂。一时也解释不清。这样的情况却经常困扰着我们：当我们谈论我们自己的祖国时，我们却没有固定的国家。不过，反过来想，坏事变好事，不少语言我们学好了，有什么语言我们就用什么语言写作，尽可能学习更多的语言，才能有比较，有辨别。卡夫卡至少熟悉三种语言，犹太语、捷克语和德语，但他用他们的官方语言德语写作。很多凭借德语创造了杰出诗篇的著名诗人，不一定是德国人。我也不是典型的德国人。我是三分之一奥地利人，三分之一中国人，因为我写中文的散文，另外三分之一是普鲁士人。再说，真正的艺术家是没有国界之分的，欧洲太多这

样的情况，没有民族，甚至没有具体的故乡。最好的语言，就是作家最好的家园。

对我来说，读卡夫卡就得丢掉自我。因为他语言的吸引力太深了，一不小心就会失掉了自我。所以，到19岁时，我决定一辈子不要再读他的小说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忽然有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诗人，请我为他的这本有关卡夫卡的书作序。几年前，我在中国海洋大学教书时，他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不能。我发誓永远不要再看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我跟我的爸爸早就告别了。还要重复告别吗？他已经死了。死了30多年了。如今，我是四个孩子的爸爸。还必须回顾吗？不要。我们这些在“二战”中长大的孩子都没有父亲！如果有的话，我们讨厌他们。他们把我们的语言破坏了，给我们吃发霉的面包、狗都不想吞下的香肠。冬天也没有像样的御寒的衣服和鞋。因为饥饿的记忆，苦难的记忆，还有一代代人秘不可宣的那些个人成长史，我们也想跟卡夫卡一样“打倒爸爸”，却又不得不用写作记录下这一切。

我写的第一部小说集《黑色的历史，黑色的故事》(2005)，大概还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我不敢再深究下去，究竟是不是这样。再读于荣健的新书，我就不得不回到我的过去。用汉语的说法，不堪回首又不得不这样。当然，这也是卡夫卡的书信方式。我每天写信，我每天会碰到类似他小说的主人公“K”，每天早上要签字，每一次签“K”，那也是我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信中我跟于荣健开玩笑说他是“小卡夫卡”，我是“老卡夫卡”。它的确是我们常常遇到的生活的“陷阱”。

无论如何，好像我还是学会了布拉格人跟别人打招呼的做法。与人碰面，他们宁愿说：“卡夫卡，卡夫卡。”其实，这是“你好”的意

思。这个问候的含义很深。它潜在的意思是：“你已经异化了还是没有异化？”好像我们没有经过异化的过程，我们就不是现代人（modern wo/man）。这个问题每个人几乎都会遇到，只要他稍加思考的话。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遭遇和经历。也许不被别的东西异化，就被自己异化。它是一个疑问句吗？但语调幽默，好像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十分肯定。

没有希望从异化的范围、从我们的 condition humaine、从我们的人间状态中挣脱出来吗？有。我们的希望在语言那里，在卡夫卡的语言里。我们也听说过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存在的房子。如果要住得舒适的话，就需要优质的语言。优质的语言并不罕见，不过，它需要耐心和发现而已。这样，才能建造起自己牢固的房子，风吹雨打也可以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伤害。

中国目前有时也会出现文雅的翻译，特别是叶廷芳先生的。因此，中国的读者应该能感觉得到卡夫卡优质的原文、译者优质的母语。于荣健用叶先生的译本，并引用了不少的引文，以利于读者的阅读和思考。他从引文出发来阐释卡夫卡的作品，有据可查，很多资料，引经据典，这是研究作家作品的可靠方法。建造房子的基础很好，有石头，有砖瓦，还有木料和水泥。再加上他前后坚持了差不多十多年的精心磨炼。但他没有从卡夫卡本人的作品开始谈中国当代文学的毛病。就谈卡夫卡不谈其他，好还是不好？我猜，这位中国诗人可能以为这是我笔下的人物。也有道理。人家不会给他打板子的，相反要打我。我习惯了。来吧。

写作就是卡夫卡的存在，最重要的存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写他的小说和其他文字。睡觉是次要的。出名，无所谓。有没有读者不要管。卡夫卡为文学而生，为他自己而从事创作。生

活为文学而非文学为生活，他敢于牺牲自己又重新创造了自己。我们嘴上常说，过文学一样的生活，大多数人都只是说说，只有极少数人这样做了。卡夫卡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另外，大概只有这样，他才能解决他生活的毛病、他的抑郁症。他必须这样。抑郁、写作与病态是分不开的：从杜甫到歌德，我们都能听到这类的信息。写是诉苦吗？不光从卡夫卡那里来看好像就是这样。不过，我们的布拉格小说家宁可要一种冷静的态度。非常冷静，有时冷静得可怕。面对死亡，他还在维也纳郊外医院的床上继续修改、校对他还没发表的作品。对卡夫卡来说，写下文字，就是他生活最高级的完成。其他的都可以牺牲，包括爱情在内。

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在他的遗嘱中，要把他还没发表的大部分作品烧掉。幸亏他的朋友布罗德(Max Brod, 1884—1968)没有听他的话，给我们留下了20世纪最优秀的文学作品。这跟老子过函谷关的故事很像，当时他没有带关牒，关令要求老子离开西域前写下他的《道德经》。他顺其自然地写下了。偶然发生的。他“莫知其所终”，但作品留下来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了。如果一把火烧掉了卡夫卡的文学遗产，我们现代人要了解我们的人生就存在困难，这种困难至少含有——一种我们总在路上追求着什么，却始终无法找到的答案。这的确是一种处境，还是一面镜子，我们通过镜子才能看清自己。因此，我们要感谢卡夫卡，布罗德(Brod)，当然也包括中国诗人于荣健，他们都在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复杂的存在。

2016年12月29日于波恩

(作者为德国著名汉学家)



# 目 录

序(顾彬) ..... 001

有意拖延的告别

——读《致父亲的信》 ..... 001

大海爱它海底的小石子

——读《致密伦娜情书》 ..... 040

为魔鬼效劳的报酬

——读《饥饿艺术家》 ..... 080

身体的赌注

——读《判决》 ..... 114

身体的疼痛

——读《变形记》 ..... 136

大鬼附身,小鬼效劳	
——读《乡村医生》 .....	174
别有用心的长城	
——读《万里长城建造时》 .....	192
梦幻之骑	
——读《骑桶者》 .....	211
主要参考书目 .....	225
后记 .....	227

# 有意拖延的告别

——读《致父亲的信》

## 打倒爸爸

父子关系，看似简单直白，甚至有点机械僵硬，但比较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或母女关系，它依旧隐秘、微妙和复杂。事实上，家庭中这样的四组关系，一直是心理学探究的重要命题。

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父子关系的极端文本。这不是一封平铺直叙的家书，由于出自卡夫卡之手，他一口气就把它写成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样本，最后，又落脚于他的精于洞察和思辨的文学之中。从文学价值上说，它的文字是罕见和优秀的，而从人生成长的角度看，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不免让人一声叹息。本文“打倒爸爸”这个小标题，借用了英国作家一部小说的名字，“打倒爸爸”，它类似于某种口号或呐喊。一方面，是爱恨交织的发狠的“打倒”，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昵称为“爸爸”——父子之间的明争暗斗，一项几乎完成不了的关乎权利和权力的任务，也是一项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老天注定了的天赋使命。无论从生物学还是社会学意义上说，“弑父”之战大概

从小小的基因传承的那一刻，就已展开了。卡夫卡在书信开头的称谓是，“最亲爱的父亲”，它就像一个意味深长的咒语，紧紧缠裹着——只要他还是爸爸，他还是儿子；只要爸爸走向了衰老，儿子就走向了成熟；只要遗传基因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是人类集体无法僭越的宿命和禁忌，无论他是哪位坚强或懦弱的儿子。

心理意义上的儿子要“打倒爸爸”，却非肉体上的。“打倒”，来自“被打倒”的高大和威慑，而非关系对等。早在卡夫卡写作这封家书的10年之前，弗洛伊德曾这样写道，“孩子的过高评价父母，也保存在正常的成年人的梦中。”——可以说，由个人到亲情，到家庭，到传统，乃至整个文化传承上，只要有父权的存在，就有儿子叛逆和斗争行为的合理、必要。由此，我们知道，个体意义上的儿子“打倒爸爸”，完全可以推及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旧更替式的“打倒爸爸”，打倒威严专制的父权，乃至皇权。它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权力斗争的方式和手段。儿子要取代父亲的角色，又不得不模仿父亲的偶像式行为，仿佛实现了超越英雄和神话的个人野心，更好地爱护母亲与家园。人类社会每推进一步，究竟有多少“弑父恋母”的悲喜剧上演？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亦不乏这样的样本。我们可以把《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们，看作是天性顽劣的孩童，他们以几近于胡闹的行为模式，拆解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与家庭结构，并宣布这种秩序的无效。那个“带头大哥”宋江或唐僧，则和与父权周旋、妥协的家中长子十分相像。而刘邦和项羽的煮父故事，则把这种挑战人伦、反抗皇权，发挥到了极致的要流氓的地步。其实，他俩都想做中国人民的大爷，所以，为了“打倒爸爸”就顾不得啥父子纲常了。看来，在这一点上，中西文化传统中，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回头再说卡夫卡，他出身在这样一个犹太家庭：作为新一代移民，父亲从乡村来到城里，做小本生意，勤俭精明，严厉强势。作为家中的长子，青少年时期的卡夫卡还是懂事的、妥协的。因为哥哥们的早夭，他不得不为父母、妹妹们作出妥协的样子，而比妹妹们承受了更多：“正是作为父亲，你对我来说是太强大了，尤其因为我的哥哥们很早就死了，而妹妹们隔了很久才来到人世，我不得不一个人承受第一次冲击，对此我的力量是太弱了。”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家中扮演的角色和位置，他一直承受着这个角色和位置带给他的一切。对于天性敏感善良的他来说，平日里私下的抱怨也会有，尤其是他与母亲、小妹奥特拉和好友布罗德之间，言谈中多多少少都曾涉及，但还在合理接受的范围之内。他是家中长子、还是社会上的绅士，他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这封带点决裂性质的家书，分明则是压抑很久的孤独和愤懑的爆发。也许，他认为他有必要厘清这一切，并为之一辩。1919年，卡夫卡36岁时，写下了这封让人潸然泪下的家书。

让我们先说说家庭生活：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无疑是从儿子的幼年开始的。儿子对父亲的叛逆和反抗，从他少年时代自我意识的萌芽、觉醒开始。无论影响还是反抗，除了幼年时父亲对儿子如此这般的舐犊之情，在其他漫长的岁月里，父与子，他们大多会在少言寡语的沉默状态下，演绎着生命伦理的一幕幕悲喜剧，而罕见热烈、奔放和激动人心的场面的出现。哪怕一个拥抱，一次握手，一个眼神，它与前述的另外三组关系——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母女关系，对比鲜明，反差极大。尤其父子单独相处的场景中，看上去，他们比两个陌生男人的共处，似乎还要隔膜和冷淡——它像某种因爱而生的羞惭的回避。除了年龄上的差异，大概还有观念

和精神上的距离。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平起平坐，常见于江湖和庙堂的男人们，而少见于大多数普通场景里相处的父子，这，大概就是家庭生活的真相之一吧。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中，轻易找到这样的西方文化原型——克罗诺斯是古希腊的神祇之一，他是推翻了自己的父亲之后才做了新一代君王的，后来，他又被这样的预言不幸言中：将来的某一天，他也被他的某个儿子无情地推翻，而这个儿子，正是大名鼎鼎的宙斯。如果我们再推及中国古代的宫廷政治，就会发现，围绕权力的世袭承继的血腥争斗，几乎涵盖了父子关系的所有，所谓外表的正大光明，实乃屡屡突破人伦底线的龌龊肮脏，此乃后话。

日常生活中，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小男人单独相处，有些压抑，有些尴尬，有些不安，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辛辣的烟草味或汗腥气。除非他们手头有共同的事情可做，共同的话题可以探讨。男人大多为问题和逻辑动物，他们凭大脑思考，少有肢体语言，或许，一次点头或摇头，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才能把这僵直、机械和腐坏了的关系，化作了神奇的默契的刹那——父亲看到了儿子的成长，儿子看到了父亲日渐老去的背影。从最初的叛逆和反抗，由时间主宰，岁月递进，从而终于达成了理解、谅解与和解——儿子脱离了父亲的大手、怀抱和肩膀，就是他与之不断拉长的、距离化和陌生化的心理过程，他怀揣了更为广阔的天地，而急于投奔到更为激荡人心的自然或社会的怀抱，从而挣脱父爱的桎梏，完成由小我到大我、从内部到外部、从时间到空间的全身心蜕变、置换。杰出的儿子，宁肯在精神上独辟蹊径，远走他乡，浪迹天涯，而不再认同父亲曾经肯定的一切，哪怕这位儿子在未来的日子里如何孤立无援，孑然一身，依然自视甚高，不肯低头。他寻找的自我，似乎已不

需要父亲的确认。

但是，需要父亲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加以肯定，并非鼎力相助的那种——事实上，日渐衰老又依靠威权树立形象的每一位父亲，对儿子的鼓励，哪怕是节制和内敛的，对绝大多数儿子来说，却是精神上的奖赏。已近中年的卡夫卡写道，“且不论以我现在的年龄，鼓舞已经对我起不了作用……当时我倒是很需要鼓励的，而且是无处不需要。”作为心理补偿，生活中紧张的父子关系，自然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自觉不自觉地呈现。至少有如下几个短篇，几乎贯穿了这一隐性的主题：《一场战斗的描写》、《判决》、《失踪者》和《变形记》等。小说中父子冲突的不同情景和类型，编织和结构了其中的人物关系。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或曰由个人生活经历、敏锐的感知带来的内心创伤，正是他写作此类小说的原始动机和助推力。写作此封家书时，卡夫卡曾与一位姑娘尤丽叶热恋，并打算结婚，却因父亲嫌弃她出身低微只得告吹。也许，这种以文字进行的自我辩解和唤醒，正是卡夫卡的斗争方式之一。

信中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这位视文学为生命的儿子，曾对父亲的冷嘲热讽，满是幽怨和悲愤。在他因病深感时日无多写下这封书信时，他对父亲当年一个不经意的行为，仍旧耿耿于怀。比如，出了一本新书，满怀喜悦的儿子希望得到父亲的鼓励，而父亲的漠然不亚于兜头浇下了一盆冷水。他写道：“你对我的书的欢迎方式已为我们所熟悉，它显然伤害了我的虚荣心、我的抱负：放在床头柜上！（每当有书送来时，你多半正在打扑克）。”儿子的新书，不如打扑克能给父亲带来乐趣，它隐含了儿子太多的心酸和无奈。为此，卡夫卡自我剖析说，那一刻，却出乎意料地，“我感到舒服，这种舒服感并非仅仅产生于突然生出的恶作剧的想法，

并非仅仅产生于关于我们之间关系的观点得到了新的证实，而引起的我心中的快乐……犹如，现在你自由了……我写的是关于你的事，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怀里不能发泄的。这是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种告别虽然是由你逼出来的，但却是朝着由我决定的方向发展着。”这段文字十分关键——从未有过的彼此解脱的自由和释然，正是父子关系冷漠到极点的畅快写照。打击由父亲而起，儿子又有了新的证据，并作出了心理上的再一次告别。“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怀里不能发泄的”，则道出了写这封家书的初衷和底细。亲情并不意味着彼此的理解，相反，有时可能碍于它带来的阻隔而出于面子上的自尊和体面，从而回避了沟通和交流的必要。此乃人性的幽暗之处，同在屋檐下，都是一家人了，有必要这样较真或认死理吗？用中国人的说法则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本就不是讲理的地方——既然告别，又要有意地拖延；既然被逼，又“由我”决定了方向。它正是这封家书的情感聚焦点，处处缠绕，怨怼百结，深邃动人。

信中描述的这个细节，还进一步印证了父子之间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因为，你无法指望一个整日为生计操劳奔忙、为儿女们能够过上主流社会富裕生活的生意人，会特别留意儿子那“没多少价值”的文字。甚或，即使留意了这样的文字，也是出于某种亲情而非真正懂得儿子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更何况，父亲原本就是一个深谙人情世故、精于算计，自我奋斗中饱尝人间酸甜苦辣咸的犹太商人，根本就不是同路人。看起来，儿子对父亲的确有些苛求了。父亲哪怕抱怨或教训儿子几句，不也是正常的？“说我由于你的劳作而得以在充满安宁、温暖、应有的环境中生活。”这位出身卑微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学好法律专业，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



而非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既分担不了商店里和家庭工厂的责任，还整天操弄文学这个世间无用的东西。

强势的父亲对倔强的儿子意味着什么？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精神灾难。说到底，双方有无驯服对方的权力意志，首先来自围绕话语权的争夺。卡夫卡的父与子的关系，虽属极端的特例，却很好地佐证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他为何成了“书写狂般”的作家，除了几部小说之外，尤为擅长日记体和书信体？这种文体需要相对孤独的心境和它的自白性，恐怕绝非偶然。作为成功的商人，父亲算不上是个好父亲。但父亲自始至终认为自己做得已经很好，儿子也始终如一地认为，这样的好，对他来说其实是变本加厉的“伤害”——另一方面，卡夫卡是一位世间罕见的优秀作家，却不能算是一个对父亲言听计从的好儿子，他自始至终认为自己的那一套价值观值得坚持——于是，父子的争斗，好像开启了漫长的黑暗的旅程——这黑暗，包括彼此之间的错误判断。好父亲好儿子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制定和主宰这样的好坏标准？这样的标准还在导演着多少家庭教育的悲喜剧？处于强势的一方，父母在实行自己的那一套教育儿女的方法时，卡夫卡的分析相当犀利。在写作这封家书之前的1914年，他给一位友人写道，“被错误判断的父母多于被错误判断的孩子，或者至少父母被错误判断持续的时间更长久。”因为，比起儿女的不断成长和身心变化，父母的自我调整和更新能力，大多停滞不前，甚至退步明显。除非他们勇于同儿女一道学习和成长，但却并不符合教育学的基本规律。卡夫卡说出了一个为人父母的真相，尽管他们或许并不愿意承认。另一方面，孩子的价值观的形成，要比父母漫长得多，艰难得多，他们确实需要父母的陪伴和指导，同时，又要避免过多的干涉。因为，作为强势的